

近現代佛教史之研究(一)

本文榮獲九十五學年度高登海居士獎學金

● 林俊裕

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

一、前言

夙稱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，淵源肇興於印土，大成鼎盛於中國，其信徒遍於東亞，教義廣被全球，是一種超民族、超國度的世界文化。佛教在理論上，曾不間斷地探索人生價值、人生本原和人生歸宿；在實踐上，曾提出或試驗過解決人生苦難和煩惱，以至生死無常等困惑的種種方案。這些理論和方案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會的認同，那是另一件事，僅就其涉及的問題本身，已足以觸動人們靈魂深處

的心弦，尤其在飽經滄桑的人群中，引發共鳴。可以說，正是佛教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佛教發展的普遍性和持久性。加上佛教學說教人求福避罪，去惡從善，因而成了維繫民心，穩定社會的一大因素，歷代朝廷均視佛教為主要價值所在。

由於我國佛學一向偏重理論，忽視歷史考證，近代因受西方和日本佛教學者治學的影響，逐漸趨向於歷史的研究。依循各國佛教學者之看法，本研究針對近現代佛教史進行一次淵源考究，範圍涵蓋中國、東亞及台灣

等亞洲主要國家。儘管歷史不會重複，但卻能經由重新探討、發掘，而達到鑑往知來之目的。

二、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之回顧與展望

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之後，引發了文化與思想的衝擊、交流以至融合，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醞釀，在渡過隋唐的昌盛期之後，漸趨衰頹。自宋、元、明以來，以禪宗和淨土為主流，晚明之際，一度有諸宗融合，義理與修行並重的趨勢。明清的政權變革之後，佛教義學的研究又趨消沉，禪宗亦因捲入清初的政教風波，在雍正王朝後，被朝廷疏離，無法獲得經濟的支柱與士大夫的向心，遂在社會大失其影響力。清末的中國遭太平天國的破壞，洋教的攘奪，已是衰邁不堪。二十世紀初，中國佛教在西方文化和民主革命潮流的猛烈激盪之下，面臨存亡的危機，反宗教運動、廟產興學風

潮，種種挑戰，重重教難，激發起佛教界救亡圖存、弘法護教的熱忱。社會的苦難，人心的不安，對西學弊端的反省及為維護東方傳統文化的意識，對救國拯世的真理之尋求，一時形成了思想文化，百家爭鳴局面。印度南亞等地的佛教復興運動的啟發，也給了中國佛教以振興的機遇。中國近代史是國難重重，中國佛教近代史也是教難不斷。處在國難與教難夾縫中的佛教，能在最近的一、二十年中浴火重生，在新時代中開拓新的局面，自然是由眾多的因素交織而成的。

中國佛教在傳統的政治制度下，不得不依附朝廷，以延續其宗教命脈。辛亥革命之後，政治局面驟變，佛教便不得不面對一個全新的生存環境，思索一種新的應世之道了。儘管這些宗教傳統往往被視為只能依循，不能改變。十九世紀末到清末民初年間，中國佛學大有復興之趨勢，但



是，這種發展的動力並非來自佛教內部，而是外在形勢的風雲際會所致，在大變革的新時代中，只好背負著沉重的傳統包袱，在劇變的社會中，有賴於肩挑住持宗教之任務的僧眾以及有學德兼備的拔尖人物出現。這些人物既能站在宗教界之頂端，也能站在學術界與當時

一流的精英分子對話，始能振起教運，帶動佛教與佛學的同時興盛。清末民初，中國的文化精英紛紛投入佛學研究，如章太炎、梁啟超、胡適之、熊十力等，都在佛學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，使佛教走上革新之途。

此外，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界亦回應時局的諸多挑戰，如太虛、張曼濤等運用西方宗教、哲學、科學知識詮釋佛法，並以佛教的觀點，對西方宗教、各家哲學、心理學、科學等現代思潮作了批判。以太虛大師為例，他是來自佛教內部而致力於開拓佛教新局面的領袖人物，也是當時中國佛教界少數以開闊心胸與全世界佛教傳承，和佛教學術界接觸、交流的僧人。其推動「世界佛教新運動」，表明是放眼全世界，而不僅限於中國。在傳統氣息濃厚的中國佛教界，太虛大師乃是走在時代前端的人物。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思想並非孤發獨明，而是啟蒙於清末的維新思想家，並且在年輕時與革命人物常有往來。他早年的思想，是在革命思潮瀰漫的社會中形成的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成功，給予他極大鼓舞，自覺要振興衰頹的佛教，僧伽教育是第一要著。因





此，一九一二年，他與志同道合的同學釋仁山，在鎮江金山寺召開中國佛教協進會成立大會時，仁山提議接收金山寺，以籌辦佛教大學，即時便在會上引起騷動，釀成「大鬧金山寺事件」。大會雖然懼於改革派的形勢而勉強通過議案，但此事卻因引發暴力反撲而告終。這是太虛大師第一次的佛教革新行動，欲順革命成功之勢，落實他佛教革新的理想。但是，他卻從此被掌控佛教資源的保守僧眾劃出界外，貼上「新僧」的標籤，而不見容於教界主流派，埋下日後屢屢失敗的種子。

二十世紀初期太虛大師發動佛教改革以來，便努力宣揚希望以建設「人間佛教」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主要目標。太虛大師認為人間佛教並非要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，或皆出家到深山寺院去做和尚的佛教，乃是以正法義理改良社會，使人類進步、世界和平的新興佛

教。太虛大師早年的改革事業乃受政治革命之啟發，以為可以用激進手段在保守的傳統佛教中進行大改革。但事與願違，他的激進新僧形象，對他的革新事業多所阻撓，他後期多番爭取佛教會的領導權，以期能夠名正言順地領導佛教改革，但都無法達成。中國佛教界在他有生之年，一直是在守舊勢力的把持之中，這一而再的失敗經驗，使他領悟到：唯有在保守思想影響較少的佛教青年群中，才能埋下佛教革新的種苗，而僧教育必然是佛教革新的後續力量。因此，太虛大師中後期的佛教革新工作以及成就，也就著重在僧教育這一環節上。

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二年的十餘年間，太虛大師先後開辦或主持了多所佛學院，包括武昌佛學院、閩南佛學院、漢藏教理院等。而其佛學院培育出來的僧青年，在日後對港台、東南亞佛教界，皆發揮了



甚大的影響力，如台灣的印順導師對佛教有顯著的影響與貢獻，這是太虛大師有生之年所看不到的。這一股十九世紀末掀起的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熱潮，於二十世紀二、三〇年代達到高峰。

至四〇年代，由於日寇侵凌，國難當頭，國人被捲入救亡和內戰的硝煙炮火中，佛教復興運動舉步維艱。到了五〇年代，在社會制度的劇變中，佛教在中國大陸陷入從未遇到過的困境。一九五七年以後，隨左傾路線不斷升級，佛教急速萎縮，十年動亂中遭逢自「三武一宗」以來又一次更大的法難，瀕臨滅絕，從漢地到蒙藏，絕大多數寺廟經像被毀，僧尼被遣散、批鬥，無數價值連城的佛教文物被破壞。直到八〇年代，宗教政策逐步落實，佛教才得以劫後重建。

一九五〇年以來，中國佛教的發展與中共的宗教政策有密切的關係。許抗生先生將中

國當代佛教分成三個時期：
一、整頓期：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期。
二、劫難期：六〇年代中期至七〇年代中期。
三、復興期：七〇年代末至今。方立天先生則將其分成四個時期：一、正常期：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。
二、緩步期：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。
三、摧毀期：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。
四、復興期：自一九七六年迄今。以上兩種分期說出入不大，說明中共在文革前對佛教的壓制是緩慢進行，佛教還可獲得部分的自主性發展。文化大革命是繼「三武一宗」後又一次更大的滅佛運動，許多佛寺被毀壞或佔用，佛像被毀，經書被焚，僧尼被掃地出門，在家佛教徒也遭批鬥，佛教協會、佛學院、金陵刻經處等佛教文化機構被迫關閉。

文革後，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，表面上讓佛教逐漸恢復生機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

象，但這些景象的背後，脫離不了中共政治力的參與。一九五二年在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下設宗教事務處，一九五四年擴大改組為宗教事務局，建立官方性質的宗教組織，如一九五三年成立了「中國佛教協會」，其宗旨：「團結全國佛教徒，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參加愛護祖國及保衛世界和平運動，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；並聯繫各地佛教徒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。」文革前，中國佛教協會對佛教的控制成效有限，文革後，中國佛教協會真正地掌握了大陸各地的佛教勢力，積極配合政府來管理佛教界。

中共對「邪教」與「迷信」的認定是極為堅持的，一般泛指危害社會、違反法律與人性、擾亂社會秩序甚至自絕於社會與人類的宗教組織均在其列。取締「邪教」與「迷信」一直是其既定的國家政策與法令，法輪功事件更強化了中共當局對邪教的管

制立場，指出邪教有六大特徵：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、編造邪說、斂取錢財、祕密結社、危害社會等。

改革開放後，佛教在社會力的釋放是有限度的，佛教的復興象徵著政治力與社會力的某種妥協，其妥協還是以不違背中共宗教政策為前提。中共近年來對無神論的堅持有些軟化，已較少宣揚讓宗教消亡的理論，而以務實的態度來面對宗教存在的事實，但是對宗教活動還是有些管制與禁令，限制宗教活動只可在政府批准的聚會處所舉行，一切宗教教育資料及宗教講解均須經宗教事務局批准。表面看起來，佛教已取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，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管制是無所不在，其底線相當明確，取締「邪教」與「迷信」一直是其既定的國家政策與法令，一旦衝擊其





底線，立即進行政治力的反撲。

近百年來的中國佛教，大體上沿著一條在厄難中圖復興、應世變而轉型的崎嶇路子行進，從適應後期封建社會的明清佛教陳腐模式，向適應近現代社會的新佛教轉型，可謂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特質。佛教的轉型，大略是在發揚傳統以及破舊立新的相互牽制中進行，在做法上，主要有：重振祖風、改革故弊、回歸原始、取法域外四種趨向。在這四種不同的趨向中振興、轉型的中國佛教，從總體上看，其內容是多元一體的。

多元，意謂發揚了傳統佛教諸宗派，繼承了傳統教義教制的基本內容，又逐步改革了教義教制中不合時宜的部分，吸取、移植了藏傳、日本、南傳佛教，使中國佛教呈現出較古代更為豐富多彩的內容。一體，謂佛教各宗各派，大體都認同、趨歸於一種

共認為應時契機而又符合佛陀本有精神的現代佛教模式。

總之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，一方面受印度文化思想持續的影響，另一方面與中國傳統思想論爭和交融、拒斥和滲透、對立與互補，不僅改造與發展了印度佛教思想，而且在大乘空宗、有宗分野的基礎上，逐步成熟為天台、華嚴、法相、淨土、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派系和獨具特色的中國佛學。與此同時，中國佛教超越追求的人生價值觀與道德觀，以及辨證思維方式，也不斷向社會各階層廣泛滲透，參與或改造中華民族文化之深層結構。

綜觀中國佛教的歷程，尤其近現代，雖經過種種挫折，但對中國歷史文化輝煌的貢獻，已獲得國人普遍信仰，儘管宗派紛雜，歧義很多，甚至時有爭論，但主流是積極向上的。㊟（待續）

